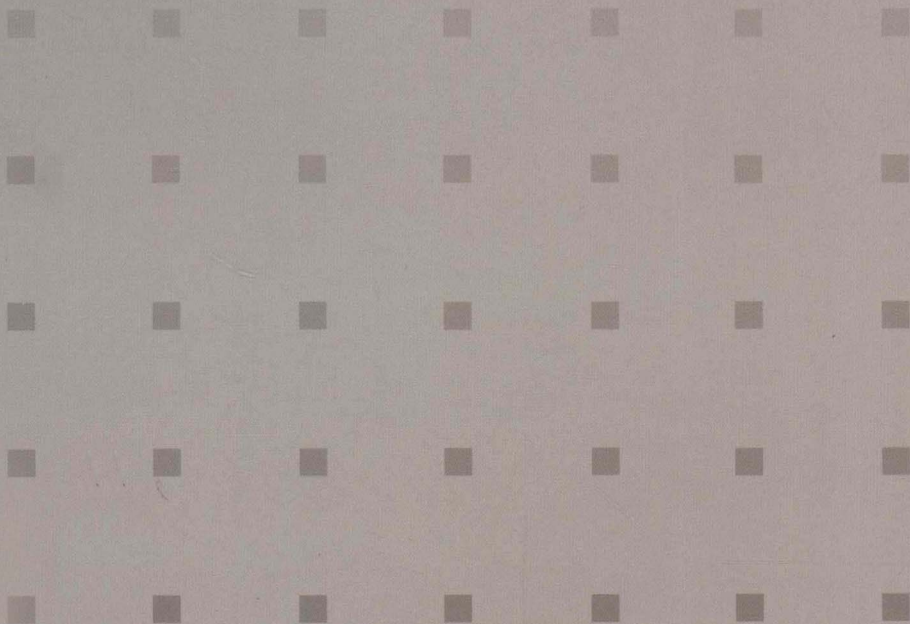


钱宾四

对文章学的贡献

张荣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文用篇

第一章 “言而有用”说的起源与流变	(3)
一、“三不朽”	(3)
二、“成一家言”	(3)
三、“经国之大业”	(4)
四、“文以明道”、“文以明理”、“文以载道”	(4)
五、“不平则鸣”	(6)
六、“经世致用”	(6)
第二章 毛泽东的文用观及其写作实践	(8)
一、文章价值标准——“有用”	(8)
二、文章的作用	(9)
三、注意针对性	(29)
四、强调时效性	(31)
五、以正确的态度写作	(33)
第三章 毛泽东发挥文用的主要方式	(41)
一、析理精微，以理服人	(41)
二、情理交融，以情感人	(43)
三、法理结合，依法治人	(44)
四、义正词严，以威慑人	(45)

文质篇

第四章 “言而有物”说的起源与流变	(48)
一、《易经》发端，儒家光大	(48)
二、传统文章学中“物”的内涵	(49)

第五章 毛泽东的文质观及其写作实践	(54)
一、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风	(54)
二、践行“言之有物”	(54)
三、为“言之有物”开辟了实现路径	(63)

文构篇

第六章 “言而有序”说的起源与流变	(81)
一、《易经》滥觞	(81)
二、历代承续	(82)
第七章 毛泽东的文构观及其写作实践	(84)
一、写文章要讲逻辑	(84)
二、写文章必须善于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112)
三、思路清晰，结构谨严	(115)

文风篇

第八章 “言而有文”说的起源与流变	(119)
一、《论语》萌芽	(119)
二、后学增益	(120)
第九章 毛泽东的文风观及其写作实践	(121)
一、合文法	(121)
二、善修辞	(122)
三、兼通变	(178)
参考文献	(186)
后记	(187)

“文章”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章，是一切用文字记载的人类精神劳动成果。狭义的文章，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表达主观情志、用于社会交际、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张会恩、曾祥芹：《文章学教程》）。本书所使用的文章概念属于后者，所使用的文章学概念，是研究狭义文章的学问。

文章发展的历史，伴随着文化发展的历史。文章学发展的历史，则伴随着文章写读实践的历史。文章写读的实践不断丰富，文章学也就不断丰富。毛泽东在继承传统文章学精华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文章学理论体系，在文章学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 用 篇

所谓“文用”，是指文章的价值、功用。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文用观，是“言而有用”。毛泽东文章学理论和文章写作实践，继承发展了“言而有用”说。

第一章 “言而有用”说的起源与流变

中国传统文章学，关于文章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强调文章的作用，即言而有用。

如若按照中国文章学产生、沿革的历程划分，可以将言而有用的文章价值观念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三不朽”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就是说，著书立说，与具有高尚的品德、建立功勋一样有价值，都是可以流芳百世、被社会 and 后人永志不忘的。“三不朽”说对我国历代仁人志士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可以举出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往往道德文章并重，文章是他们安身立命和安邦治国的重要工具，也是他们扬名后世的重要因素。

二、“成一家言”

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约前145—前90），主张“发愤著书”“成一家言”。他认为，处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其遭遇是不同的。

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若无法实现，则可以借“述往事，思来者”的文章、著作作为寄托，并在文章、著作中提出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看法和主张，“成一家言”，以昭示后人并丰富人类社会思想文化宝库。司马迁“成一家言”的主张为中国有理想、有抱负却壮志难酬的进步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用文章、著作奉献社会的现实道路。更为可贵的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就极刑而无愠色”，在逆境中奋起，以毕生精力写出了《史记》这部流传千古、影响历久不衰的伟大著作，为后代学人树立了用文章服务社会的光辉榜样。

三、“经国之大业”

到了曹魏时代，曹丕（187—226）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他认为，文章可以用来治理国事，人可以凭借伟大、优秀的文章使荣誉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代代相传。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曹丕这种文章价值观。商代盘庚迁都殷，贵族和一些民众反对，盘庚就发表了三篇演说辞《盘庚》，说服民众，号令群臣。一提起孔子，人们会首先想起，中国第一部私人编纂的历史著作就是他的《春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春秋》一直被儒家、儒生奉为经典，孔子的名字也伴随着《春秋》《论语》而妇孺皆知，当今，世界上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亦非个别。李斯，以一篇《谏逐客书》，在秦代的文化荒原上留下了一抹亮色。前已提及的司马迁，《史记》就是他的名片。曹丕本人，以《典论·论文》开了中国文章学的先河和文学批评的风气。

四、“文以明道”、“文以明理”、“文以载道”

“文以明道”说可以追溯到荀子。荀子（前 325—前 235）是一位以儒家

思想为主，同时吸收了其他各家思想的集大成思想家，他认为文章的价值和作用在于“明道”。他在《荀子·正名》篇中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就是说，言辞、文章要符合辩说的需要，辩说应当与人的思想相符合，而人的思想必须符合“道”。一句话，言辞、辩说、文章是人对道的认识、理解的产物，是用于“明道”的。

荀子的“文以明道”说，由扬雄（前53—18）和刘勰（约465—520）继承并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重要原则：原道、征圣、宗经。即，人们的行动、文章都要以圣人为标准，文章的本质就是以“道”为内容，宣扬“道”，传承“道”。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所谓“德”，就是得道之意，文章作为“道”的体现，其地位和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与天地并生”，因为它与天地一样，都是“道”的体现。刘勰主张“征圣”，就是认为孔子“熔钧六经”，起到了“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重要作用。

韩愈（768—824）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思想。他在《争臣论》中写道：“君子居其位，则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他自己提倡古文、写作古文，就是为了提倡古道。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愈又敢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十分明确地指出文章的作用在于“明道”，而非为文而文。

周敦颐（1017—1073）在《周子通书·文辞》中提出“文以载道”说，认为文章的价值体现在充当“道”的载体，而不能以文为目的。

清代桐城派的继承者姚莹（1785—1853）对文章价值的论述，其中心同样是强调“载道”，《复吴子方书》说：“仆少即好为诗古文之学，非欲为身后名而已，以为文者，所以载道，于以见天地之心，达万物之情，推明义理，羽翼六经，非虚也。”

刘熙载（1813—1881）认为文章是用来“明理”的，“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而“明理”则是为了“醒人”。（《艺概·文概》）

五、“不平则鸣”

韩愈认为文章、著作是“不平则鸣”的产物。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假之鸣。”文章主要是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的，尤其是在遭遇不平之时表现作者的愤慨和抗争。

六、“经世致用”

王充（27—约97）认为文章应有补世用，劝善惩恶，“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载。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他写作《论衡》就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妄之分”，是为了帮助人们破除神学迷信。

柳宗元（773—819）在《答吴武陵论非国书》中说：“仆之为文”，“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他是在讲文章的作用在于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欧阳修（1007—1072）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指出，文章之“本”，在于“见其弊”，“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认为文章的本质和价值体现在针砭时弊，有补于世。

姚莹认为：“文章之大者，或发明道义、陈列事情，动关乎人心风俗之盛衰。”（《黄石香诗序》）

龚自珍（1792—1841），反对文人只钻故纸堆，或空谈义理心性，提出“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呼吁文章作者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改革现实、抨击社会弊端而写作。

魏源（1382—1444）的文章价值观也是经世致用，认为文章是挽救民族

于危难之中、振兴国家的工具，具有救世济时的社会功用。他在《秦中杂感十三首》之十一中说：“天地有时龙变化，英雄无运鹿奔驰。文章要在经纶后，落日柯亭吊所思。”表明自己写作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经天纬地，改革时弊，而不是为文而文和追求文章的显赫。

梁启超（1873—1929）主张“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他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指出，报纸必须“思想清而正”，“摧陷廓清”“古来误谬之理想”，“取万国之新思想贡于其同胞”，“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梁启超的文章价值观，是与他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激进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密不可分的。

第二章 毛泽东的文用观及其写作实践

一、文章价值标准——“有用”

毛泽东继承了中国文章学“言而有用”说的优秀传统，强调文章的价值评判标准是“有用”，指出：“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以下引文版本同））即，文章有没有价值，其价值的大小，关键在于是否有用。有用的文章就有价值，作用大的文章，其价值就大，反之，就没有价值，或价值很小。显然，这种主张是继承了前贤“经世致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的观点。

毛泽东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远大的抱负，以天下为己任，而文章就是他救国救民的重要武器。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建议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并担任主编。当时年仅25岁的毛泽东，一面投身于革命运动的实践之中，一面致力于革命理论的创立和宣传，自己动手撰写了该刊的大部分文章。在《创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这两个令他奋斗终生的目标，同时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显然，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利用文章公开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观点、人生奋斗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理想、目标的切入点和途径——解决土地问题、民众

联合、无所畏惧。1919年底,在由毛泽东组织发起的湖南省驱逐张敬尧的运动中,毛泽东一方面投身于斗争第一线,一方面注重发挥新闻舆论的特殊作用,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任社长,夜以继日地撰写、发表大量的驱张宣言、通电和呈文,将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反军阀的宣传。到了1920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大量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后,毛泽东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于是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且终身未曾动摇。这就使毛泽东得以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去观察、分析、探索、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使他的文章的“有用”建立在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

二、文章的作用

(一) 反映客观事物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是对文章本质和基本作用的深刻揭示。文章反映客观事物,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道”,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大致相当于前已述及的“明道”、“载道”。

毛泽东对文章作用的这种阐述,又是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物一意一文”说的继承。陆机(261—303)在《文赋》的小序中对《文赋》的写作目的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曾做了明确的阐述:“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潜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这里的“物”,指人的思维活动的对象;“意”是指构思过程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文”是指用语言文字写成的文章。“物”“意”“文”三者的关系,就是客观事物对人产生了影响,人对客观事物有所感悟,有所认识,然后整理、抒写出来,形成文章。同时,陆机又看到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认为“非知之

难，能之难也”，即，要认识“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是不困难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实践中去解决它。

而毛泽东对上述文章作用、文章价值观的发展则在于，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深刻而正确地阐述了文章写作的内在规律，回答了文章如何反映客观事物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理性认识（意）依赖于感性认识（物），没有实践体验和经验，没有感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另一方面，理性认识（意）是对感性认识（物）的发展和升华，“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的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实践论》）文章（文）正是理性认识（意）的载体，因而，对人类认识过程的揭示，就是对文章内部规律的揭示。这就将“文以载道”、“文以明理”、“文以明理”说进行了改造，将其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二）“是专为影响人的”

毛泽东在揭示了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本质之后，又进一步明确了文章的最终旨归“是专为影响人的”（《反对党八股》）。毛泽东这种朴素的文章价值说，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博大精神。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客观事实：同一客观事物，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换言之，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其各自的感觉、认识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以表现在程度、范围等方面。比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来这一现象，绝不只牛顿一个人遇到，但却只引起牛顿一个人思考，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再比如，商品这种事物，产生年代那么久，几乎人人天天接触，但只有马克思发现了它所包含着的生产关系，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



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里固然强调的是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但毛泽东并没有否定天才条件的作用。可见，世间事物，并不一定能够引起所有感觉到它的人的思考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而往往只是引起部分人甚或极少部分人的思考，于是，真理便由这部分人首先发现了。接下来，能够将所发现的真理及其发现的过程诉诸笔端，写成文章、著作的人，又少了，直至只有“这一个”。于是，这个人，就肩负着“发人所未发”、“发人所不能发”的历史使命，用自己“成一家言”的文章、著作去“影响人”。因为发现真理不是最终目的，发现真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懂得并掌握真理，用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使人类社会成为意义社会，使人类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马克思花毕生精力写作《资本论》，是为了唤起全世界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联合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人类解放、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毛泽东认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好”。（《论持久战》）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极其重视发挥文章“影响人”的作用。

毛泽东用文章“影响”的对象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人民群众、国际社会和敌对势力。

1. 指导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有社会学家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包括了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领袖和千百万群众的作用。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因此，也可以说，人民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党建设如何，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和方向。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将党的建设的目标确定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

(1) 关于党的思想建设。

毛泽东认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搞好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建设，毛泽东一方面告诫全党：“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论联合政府》）他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另一方面，他亲自动手撰写了大量文章、著作，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教育。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从党外来说，是处在这个阶层的包围之中。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了大多数。这是党内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思想方法方面，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段经验，不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这两部著作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2) 关于党的政治建设。

首先，为党确立政治纲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中，为全党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在此基础上为党确立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毛泽东这一系列文章、著作，教育全党既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目标，又自觉地不放松领导民主革命的努力。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注重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党的政治建设。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毛泽东适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纲领。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

其次，为党制定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关于情况的通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和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关于工商政策》）因此，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撰写文章，为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为湘赣边界党领导的红军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些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使当时党领导的红军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进剿”军艰苦斗争，使根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抗战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我党领导的只有4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就发展成为100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

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为全党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错误，强调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在1941年和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形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力更生精神，成为我党、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对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要求在自卫战争中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恢复中国人民的和平。毛泽东制定的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方针是：一般的是运动战；与群众亲密合作；作持久打算。在毛泽东所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导下，我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不断给进犯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中，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在解放战争后期，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政策，造成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此，毛泽东于1948年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工商业政策》，重申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个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引导全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